

官立漢文女子師範學堂（1920-1941）： 香港僅有的女子師訓院校

方駿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

1920年，香港政府為了解決日漸增多的學童就學問題，同時成立了官立女子漢文師範學堂和官立漢文男子師範學堂。這兩所學校與1914年開設的官立實業專科學校漢文師資班和1926年建立的官立大埔師範學校，共同為當時香港各區漢文學校培養、培訓合格的師資。自1920年創立到1941年停辦為止，女師前後一共畢業學生二十一屆二百零二人，為香港基礎教育（特別是女子教育）的發展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由於至今尚未有人對這所早期師訓學校從任何角度進行研究，以致包括教育界的絕大多數港人對它幾乎毫無認識。本文通過搜尋各類零星的文獻資料，希冀盡量理清這所香港歷史上僅有的女子師範學校的發展線索，還其在香港師範教育史上的應有位置，並以此引發同好進一步研究女師及香港教育史的興趣。

The Vernacular Normal School for Women (1920-1941): The Sole Female Teacher Training Institute in Hong Kong

The Vernacular Normal School for Women (VNSW) was established in September 1920 b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under the governorship of Sir Reginald Edward Stubbs (1919-1925)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hortage of qualified schoolteachers. Together with the Vernacular Normal School for Men (1926-1940) and the Vernacular Tai Po Normal School (1926-1941), the teacher training institutes supplied majority of the qualified pre-service Chinese teachers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ensuing two decades. This paper, usi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ources, discusses the background of establishment, staff and students, curriculum, and closure of the VNSW, as well as its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gress of Hong Kong's female education.

一、前言

1920年，香港政府為發展本地的中文教育，解決日漸增多的學童就學問題，同時成立了官立女子漢文師範學堂（Vernacular Normal School for Women，1920-41，簡稱女師）和官立漢文男子師範學堂（Vernacular Normal School for Men，1920-40，簡稱日師）。這兩所學校與1914年開設的官立實業專科學校（Hong Kong Technical Institute）漢文師資班（1914-50，俗稱夜師）以及1926年建立的官立大埔師範學校（Vernacular Taipo Normal School, 1926-41，簡稱埔師），共同為當時香港各區漢文學校培養、培訓合格的師資。因為這四所師範學校的教學語言均為中文，性質相同，其畢業生又於1938年聯合組成「香港漢文師範同學會」，所以統稱「漢文師範」。時至今日，由於四校的歷史相對久遠，加上缺乏相應的研究，許多人都誤以為「漢文師範」乃一所學校，更遑論清楚了解四校各自的歷史發展和貢獻了。筆者曾寫過一篇介紹埔師歷史發展及其對新界基礎教育所作貢獻的文章（方駿，2001，頁137-156），本文則集中探討女子漢文師範學堂，至於日師及夜師，則會在日後繼續評介。

自1920年創立到1941年停辦為止，女師前後一共畢業學生二十一屆，培養合格教師二百零二人，她們為香港的基礎教育（特別是女子教育）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可惜的是，學術界至今還沒有一篇專門的文章去研究它的歷史、探討它的貢獻，以致包括教育界人士在內的大多數港人對它幾乎毫無認識。本文採用尋、耙疏各類文獻資料的方法，盡量理清這所基本為人遺忘的早期女子師範學校的發展線索，還其在香港師範教育史上應有的位置。但由於女師的檔案材料闕如，其他文獻資料也極其零散，加上筆者聯絡不到現仍健在的女師畢業生進行訪談，仍有不少相關的細節問題一時無法弄清。本著拋磚引玉的精神，希望以此引發同好研究女師及香港教師教育歷史的興趣。

二、開辦女師的社會背景

香港最早的全日制師訓學校，是1881年成立的官立師範學堂（Government Normal School）。可惜這所學校只開辦了兩年就在創辦人軒尼詩總督（John Pope Hennessy, 1834-91）離任、英國殖民地大臣反對、港府教育委員會向繼任總督寶雲（George Bowen, 1821-99）提出不利建議等綜合因素作用下夭折了。官師前後共有兩名教師任教、不足二十名學生就學，關閉時只有七名學生，其中兩名進入香港英文學校任教，一名加入政府衛生部門當翻譯，另外四人則去了天津的中國政府醫院繼續深造（Grossman, et al, 2002, p. 2）。

女師和日師成立前，香港培養合格漢文教師的一個重要場所是1907年成立的香港實業專科學校（一稱香港科技專科學校）於1913年開設的漢文師資班

(Vernacular Teacher's Class)，它負責培訓在職的非合格教師，夜間上課，男女師訓班分別設在皇仁書院和庇理羅士女校內 (Education Department, 1914, p. 95)。1935 年改稱官立夜學院 (Evening Institute) (Hong Kong Government, 1935, p. O24)。漢文師資班的課程為期三年，畢業生的資格受政府認可 (阮柔，1948，頁 88；Hong Kong Government, 1938, p. 111)。夜師在日治時期 (1941-1945) 被迫關閉，戰後重新開設，假般含道的羅富國師範學院校舍上課，直到 1950 年停辦為止。1914 年至 1950 年期間，漢文師資班總共培訓了二十七屆、四百五十五名在職教師，平均每屆畢業學生約十七人 (漢師校史編印委員會，1967，頁 16-22)。

此外，香港皇仁書院等名校有時也開班培養中小學師資。這一做法最早可以追溯到 1865 年。當時中央書院 (Central School，皇仁書院的前身) 首任校長史釗域 (Frederick Steward, 1836-1889) 從該校挑選兩名成績優異的學生，計劃為他們提供為期兩年的師範訓練。這兩位學生後來均被商界聘用，史釗域不得不改選其他學生接受師範訓練 (方美賢，1975，頁 25)。1887 年，中央書院第二任校長黎璧臣 (George Bateson Wright) 考慮到該校新校舍即將落成，屆時需要增聘教師來教授擴招後的學生，乃在校內選擇六名高年級的優秀學生為師範生 (pupil teachers)，要求他們同學校簽訂一份為期三年的合約，並向政府繳付一百元的保證金，以示認真。1904 年，政府又任命丹拿 (Bertram Tanner) 專門負責培訓師範生。他們每日學習英文、教育學、教學法等課程兩小時，其餘時間在初級班授課。這種師範訓練方式，不但為皇仁自己提供了所需的師資，也為中港兩地培養了一些頗有影響的知名人士，如曾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的王寵惠 (1881-1958)、香港大地產商利希慎 (1879-1928)、曾任男子漢文師範學堂校長和官立鄉村師範專科學校校長的黃國芳 (1903-1983) 等等。然而，借助中學師資班培養學校教師，終非長久之計，而且在開辦的半個多世紀裏 (1865-1920) 所培訓的教師數量也極為有限 (王齊樂，1996，頁 286-287；方駿、何麗芳，2001，頁 317)。

晚清中國內憂外患，政局動盪。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政府後，中國陷入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面，直到 1927 年國民政府北伐成功，才把國家重新統一起來。在這十幾年的軍閥混戰時期，華南沿海的不少居民前來香港避難，造成香港人口的急劇膨脹 (王齊樂，1996，頁 254)。1921 年，全港人口達到 838,800，比 1881 年的人口總數 160,402 增加了五倍多，平均每年增長約百分之十三 (湯開建等，1998，頁 246-376)。詳情見表一。

與華人人口飛速增長相伴而來的是對於中文教育的殷切需求。僅靠夜師平均每年培訓不足十七名畢業生以及藉名牌中學培養少數師資，是不能滿足當時香港學校教育對師資的需要的。夜師培訓的是非合格在職教師，皇仁書院等名校的師資班所訓練的職前教師數量則是杯水車薪。很顯然，要解決當時香港學校所面臨

的漢文師資短缺的問題，必須有培養合格職前教師的專門院校。這是香港政府教育當局同時開辦日師和女師的主要原因。

表一： 1881-1921 年間香港人口的增長

年代	人口總數	非華人總數	華人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 (%)
1881	160,402	9,712	94
1991	224,814	10,494	95
1901	300,660	20,096	93
1911	625,166	14,798	98
1921	838,800	19,400	98

資料來源：湯開建等（1998）：《香港 6000 年》，頁 246, 292, 332, 376。

另一方面，香港政府也需要任用一些它可以放心的教師來發展香港的中文教育。中華民國建立後，內地不少滿清遺老或不滿革命的守舊士紳紛紛來港定居。他們中的部分人士從事辦學、教書生涯，但香港政府對他們並不放心。為了有效地監管全港的中文教育，教育當局除了用定出嚴格的教育條例、出版新式教科書等辦法來加強對漢文學校和私塾的管制外，成立自己的師訓學校，訓練本地師資，也是一個有效的辦法。

1912 年廣州人何慶元在港島雲咸街開辦懿德女學校，附設師範科。雖然港府最後成功地以師範班只能由政府經辦為理由，勒令懿德女學校停辦師資班（陳謙，1985，頁 34），這次事件對港府決定建立自己的師範學校無疑起了一定的刺激和推動作用。女師和日師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由第十六任總督司徒拔（Sir Reginald Edward Stubbs，1876-1947，1919-25 年在任）管治下的港府拍板成立的。

三、分設女師和日師的原因

為什麼香港在 1920 年同時成立女師和日師兩所獨立的學校而不是合二為一呢？這應該同中國國內教育事業的發展對香港的影響和早期香港本身學校中的少年男女分開授課有關。1903 年，清朝政府頒佈《癸卯學制》，規定師範教育自成系統。同時頒佈《奏定初級師範學堂章程》和《奏定優級師範學堂章程》，規定師範教育分初、優兩級。1907 年 1 月，清朝政府又頒佈《欽定女子師範學堂章程》，准許各地為解決女子小學堂和蒙養院所需的師資，創辦初級女子師範學堂，開中國女子師範教育之先河（毛禮銳、沈灌群，1988，頁 98-99）。民國以後，政府繼續在全國各地開設獨立的女子師範院校（田正平、蕭朗，2000）。

而當時香港的學校教育中，女子教育也是同男子教育基本上分開進行的。香

港的女子教育首先是由教會發起的。1841 年由美南浸信會（Southern American Baptist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叔末士牧師夫人何顯理女士（Mrs. Henrietta Hall Shuck）於皇后道浸信會禮拜堂開設的女塾是本港第一所女校（邱小金等，1993，頁 27）。1862 年，聖公會開辦了拔萃女學（Diocesan Female Training School），招收華籍女童。1890 年以前，本地女童要讀書，只有去教會開辦的學校。政府經辦的第一所女校是 1890 年創辦的官立女子中央書院（Central School for Girls）。此校後因猶太富商庇理羅士（E.R. Belilios, 1837-1905）捐款二萬五千元興建新校舍，於 1893 年改名為庇理羅士女校（Belilios Public School, 1990, p. 9）。

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男女學童也有同校教育的，但只限於十歲以下學童，即小學男校可以接受十歲以下的女生，小學女校亦可以接受十歲以下的男生。高等教育方面，香港大學在成立後九年即 1921 年才開始接納第一批三位女生，當中包括時任教育署長艾穎（E.A. Irving）的女兒艾惠珠（Rachel Irving）和早期香港閩人何東（1862-1956）的女兒何艾齡（Hoe, 1991, p. 221; Cheng, 1976, p. 79）。十至十八歲左右的學生則是男女分校教育的（阮柔，1948，頁 71）。在學校的管理方面，男、女學校的校長不能互相兼任，即男校的校長不能兼任女校校長，女校的校長不能同時擔任男校校長一職（陳謙，1985，頁 21）。在這種少年男女分校教育的背景下，培養初等師資的男女師範學校自然也就分開成立了。

四、師資

女師前後一共有二十一位講師，其中十四位為男性，七位為女性，比例正好二比一。男教師有桂玷、區大典、楊鐵夫、伍伯強、白直甫、陳雪橋、歐棗洲、伍頌圻、盧鳳翔、潘翊雲、張鑒光、馮漸達、寶壽臣、戴容鉞；女教師包括校長陳逸馨、鄭瑞霞、陳慧賢、呂志賢、劉碧蓮、霍鳳儀、謝蘊儀（香港漢師同學會，1967，頁 10）。他們中的大多數，生平事跡已不可考，下面是筆者蒐集到的零散史料中所能見到的其中六位教師的點滴情況。

校長陳逸馨，廣東海南人。早年就讀於庇理羅士女校，以聰穎勤學著稱。1914 年獲官費資助進入剛剛開辦的香港官立實業專科學校漢文師範班就讀，1916 年畢業，入母校任教。在女師開辦的二十一年中，她一直擔任校長（謝蘊儀，1959，頁 31）。從歷年政府的行政報告來看，陳氏的工作表現頗令教育當局滿意，總是受到贊揚。1941 年女師停辦後，陳氏改任東區漢文女子中學校長，香港淪陷後流落廣西桂林，戰後返回香港再擔任醫院道官立漢文女子中學校長一職。1949 年退休後，陳氏積極參加由日師、女師、夜師及埔師四校畢業生聯合組成的香港漢文師範同學會的活動，並擔任該會會長和監事長多年。1959 年陳氏逝世後，其遺囑執行人向政府捐出三萬餘元，設立陳逸馨獎學金，每年撥出六百元獎勵漢

師同學會屬下各小學的優秀學生（趙世光，1963，頁3）。

在女師，陳氏除擔任行政工作外，還任教各科教學法、學校行政、教育史等課（謝蘊儀，1959，頁31）。據女師畢業生譚雪梅回憶，陳氏的授課，娓娓動聽，有如磁石般地吸引著每個學生的注意力。譚氏並將陳逸馨的教育心得，歸納為以下三點：一、教師應以身作則，在潛移默化中培養學生的正確觀念；二、教師要按照學生的個性、天資和所處環境，分別誘導，耐心教育，務使每個人都能有所造就；三、教師應尊重學生，不能粗暴對待他們。對他們的錯失，應及時糾正，同時說明原因，使其心悅誠服（譚雪梅，1950，頁15-16）。

女師的師資中，有數位男教師也在港大或日師任過教，包括區大典、桂玷、楊鐵夫、白直甫、寶壽臣等，但他們是同時在兩校兼課還是各有前後，暫時不得而知。從這些學校均設在港島以及女師培訓女性師資的事實來看，他們兼教女師的可能性更大。1933年，日師和女師同時增開國語課，教師為同一人（Hong Kong Government, 1933, p. 019），這一事實也許可以作為兩校同時聘用部分教師的佐證之一。

在女師專任或兼任講師中，有不少是學識淵博的學者。如區大典，與香港大學中文系創系主任賴際熙（1865-1937）同年出生，同為光緒29年（1901）進士，民國建立後移居香港，又同屬港大中文系的開山鼻祖（賴際熙，2000，頁156，165）。1930年2月，他與賴際熙、陳煥章、李景康（1891-1960）、林棟等人發起成立港大中文學會，並出任首屆會長。該會的宗旨是「溝通中西學說，別其異同，辯其得失」，成立後經常就中國文學、歷史、哲學及新文化等問題召開研討會，並發表演講。1930年該會邀請戴季陶（1891-1949）演講「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化上之地位和價值」，聽者多達千人（港大中文學會，1990，頁10；湯開建等，1998，頁438）。在港大和女師，區大典主講經學。據他的學生吳天放回憶，區氏在港大授課時，「不挾書卷，而篇章朱注，皆能口誦如流」（吳天放，1969，頁24）。他著有二卷本《老子講義》，詳釋道家經典《老子》八十一章（區大典，1970）。

楊鐵夫（1887-1966），香山（今廣東中山縣）人，現代著名詞學家。他首次將南宋詞人吳文英（號夢窗）的三百四十首詞全部詳加箋釋，1936年由無錫民生印書館刊印。1992年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吳夢窗詞箋釋》，就是在吳氏1936年箋釋本的基礎上重新校點的（楊鐵夫，1992）。除此之外，他對北宋著名詞人周邦彥（1056-1121）的清真詞的箋釋，也頗有成就（楊鐵夫，1974）。可惜由於楊氏香山口音太重，加上講話速度過快，學生不易聽懂，女師後改聘夜師畢業、深受區大典賞識的伍伯強任教（陳謙，1985，頁33）。

白直甫（1881-1959），廣東人，早年在吳稚暉（1865-1953）、紐永建所創

辦的兩廣大學求學。1911 辛亥革命後移居香港，1916 年香港官立實業專科學校漢文師資班第一屆畢業生，與女師校長陳逸馨同學。1941 年香港淪陷後去廣東韶關謀生，重光後返港，後在金文泰中學任教（趙世光，1959，頁 32）。著有《白直甫先生詩文鈔》等書（白直甫，1954）。

女師還有兩位自己培養的畢業生留校任教，即第三屆（1924）畢業生謝蘊儀和霍鳳儀。謝氏畢業後留校任教，直到女師停辦為止。後隨陳逸馨入官立女子中學，1962 年退休（趙世光，1963，頁 3；漢師同學會，1967，頁 13）。霍氏則於日本入侵香港時，在堅尼地道住所被迫跳樓自殺（陳謙，1985，頁 33）。

五、校舍、學生及其學習生活

女師前後一共有兩個棲身之地，真正的校舍只有一個。自開辦至 1926 年，女師假庇理羅士女校位於荷里活道的校舍上課。該校舍 1893 年 12 月落成，為一座三層的大樓，每層設有四間各可容納四十八名學生的課室（湯開建等，1998，頁 253）。兩校的上課時間錯開，上午 8—12 點由庇理羅士女校使用，下午 2—6 點則為女師上課時間（Belilios Public School, 1951, p. 17）。

1927 年，女師搬至利園山道正式校舍。此地設備良好，擁有十二套房間（Hong Kong Government, 1928, p. O24）。自此直至 1941 年停辦，女師一直以利園山道六十九至七十五號為校舍（謝蘊儀，1959，頁 31）。1931 年，政府又在加路連山道撥了一塊運動場地給女師，為其學生提供了一個可以打籃球和排球的地方（Hong Kong Government, 1932, p. O23），女師學生的體育活動因此而較早前豐富。

每年申請入讀女師的學生大約是實際收生總數的三至四倍，如 1931 年有一百六十名學生申請該校，結果由於學校場地的限制，收生四十三名（Hong Kong Government, 1931, p. O23）。在其開辦的歲月裏，女師前後共有二十一屆學生畢業。其中最少的兩屆（1923 年和 1926 年）分別有兩人畢業，最多一屆（1941 年）畢業三十人，平均每屆不足十人。詳情見表二。

表二、女師歷年畢業人數

年份	畢業人數	年份	畢業人數	年份	畢業人數	年份	畢業人數
1922	3	1928	8	1934	14	1939	7
1923	2	1929	4	1935	10	1940	17
1924	8	1930	4	1936	20	1941	30
1925	7	1931	8	1937	4		
1926	2	1932	11	1938 (7 月)	5		
1927	7	1933	9	1938 (12 月)	23	總共	202

資料來源：漢師校史編印委員會（1967），《香港漢師畢業同學錄》，頁 13-15。

與日師、夜師、埔師等官立師範學校一樣，女師的畢業班學生要通過教育司署主持的畢業試才可拿到教師證書（Teacher's Certificate），並在登記成爲註冊教師（registered teacher）前接受漢文視學官的面試（Yu, 1999, p. 28）。表三所列是 1925 年至 1934 年這段期間八年的考試通過率。總體來看，女師的畢業試通過率以當時的標準來衡量是相當不錯的，平均達七成，比位於新界的埔師畢業班一成左右的考試通過率要高出許多（方駿，2001，頁 145）。

表三、女師歷年畢業試通過率

年份	參加畢業試學生	通過考試的學生	成功率（%）
1925	8	8*	100
1926	9	5*	56
1927	11	7	64
1930	11	7*	64
1931	12	8	67
1932	17	11	65
1933	13	9	69
1934	17	14	82

資料來源：Administrative Reports 1925-26, 1930-34。* 與漢師校史編印委員會所編《香港漢師畢業同學錄》資料不一致，後者的數字分別爲 7（1925 年）、2（1926 年）和 4（1930 年）。

女師學生的衣著有統一的規定，需著白衣黑裙校服，留長辮。剪短髮者雖然不加禁止，但少之又少。校服款式爲二十世紀初期的小姐裝束，所以女師學生一出校門，很容易被街坊認出是「皇家師範生」，畢業後是吃「皇家飯」的（陳謙，1985，頁 33）。

由於政府對師範教育提供補貼，女師的學費很低，每月兩元，全年二十四元，比當時一般中學的收費要低（Education Department, 1921, p. 07）。不僅如此，女師的學費二十多年裏始終維持在這一象徵性的水平上，而同期絕大多數中小學的學費都有所增加。如皇仁書院 1928 年的學費是每月八元，至 1932 年則升到每月十元（Hong Kong Government, 1928 & 1932）。

六、學制、課程及畢業生的就業情況

女師的學制前後有過三次變化。1927 年以前，女師同日師一樣，實行兩年制。1927 年，開始增設一個第三年師範班，爲那些兩年制課程的早期畢業生提供深造機會（Hong Kong Government, 1928, p. 024；Sweeting, 1990, p. 351）。1928 年以後，女師的學制正式由兩年延長至四年。1938 年又由四年制縮短爲三年制，直到女師停辦爲止。

學制由兩年增至三年甚至四年，是因爲學校發現學生的基礎薄弱，需要爲她

們補習小學課程（Education Department, 1928, Annex C; 1929, Annex C）。這同埔師的改制是一致的。當年埔師由第一屆（1926-28）的二年制改為以後的三年制，也是因為學校發現接受二年制師訓的學生水準偏低，難以勝任小學的教學工作（Hong Kong Government, 1939, p. O14）。至於 1938 年學制由四年改為三年，相信應該同當時生源較早期的要好以及當局希望女師能與日師、埔師等學校相若有關。

女師的教學科目同日師差不多，計有經學、中國歷史、外國歷史、國文、作文、英語、世界地理、算術、代數、教授法、管理法、教育學、實習教授、中國畫等等（金文泰中學，1962，頁 122）。經學注重《四書》，史學用《通鑑輯覽》，文學除《昭明文選》外，還採用《唐宋八大家讀本》等。其他課本包括《張太史（謇）經義》、《駢林摘艷》等（陳謙，1985，頁 33）。1929 年港府頒佈的《中小學課程標準》，要求全港公私立學校依例施行。按此課程標準，小學課程包括國文、算學、歷史、地理、公民常識、衛生、英文、體操、音樂、藝術等科（吳倫霓霞等，1989，頁 177-178）。作為政府的師訓院校，女師無疑要在自身的課程上配合政府的小學課程。

1932 年，隨著前一年政府提供加路連山道運動場地給女師，學校開始增設體育課（Hong Kong Government, 1932, p. O20）。一年後，國語又成為女師的一門正式課程（Hong Kong Government, 1933, p. O19）。

作為師範學校，女師自然還要在學科以外開設教學法方面的課程。據教師謝蘊儀回憶，校長陳逸馨在女師所任教的科目包括各科教學法，學校行政、教育史（趙世光，1959，頁 31），有此可見，教育史也是該校所開科目之一，至於是西方、中國還是香港教育史，則不得而知。

同樣地，作為準教師的女師學生也要進行教學實習。1931 年，女師設立高小部（Division of Upper Primary），由五、六年級兩班組成（Hong Kong Government, 1932, p. O20；陳謙，1985，頁 33），這給女師學生的實習提供了極大的方便。至於實習的形式、時間長短、成績的評估方式，暫時也不清楚。

由於女師規模不大，平均每年畢業學生不足十人，加上學校直屬教育司署，畢業生的就業情況良好。1939 年 5 月 9 日《星島日報》一則題為〈本港教育當局加緊訓練師資〉的報道，提到女師「歷屆畢業生，多已在教育界服務」。而教育署為了鼓勵全港各校聘請女師畢業生，特規定津貼學校的等級，和該校聘用女師畢業生的人數多寡掛鉤：任用四人或以上者為頭等津貼學校，聘請三人者為二等津貼學校，僱二人者為三等津貼學校，用一人者為四等津貼學校。

七、女師的停辦及其對香港女子教育的貢獻

女師於 1941 年送走最後一屆畢業生後停辦。與埔師不同的是，女師的關閉與同年 12 月底日本侵佔香港無關，它是一個多年前已經做出的決定。1935 年，應港府邀請來港考察教育的英國皇家視學官賓尼（Edmund Burney），在其報告的第四部份，提出香港應擴充香港實業專科學校的漢文師資課程，或新建一所政府師範學校（Burney, 1935, p. 23）。1937 年，港府委任以連素法官（R. E. Lindsell）為首的師資培訓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Training of Teachers），對香港的師資培訓制度進行全面調查。翌年 3 月，委員會提出報告，也建議設立一所新的師範學院（Teachers Training College）（Hong Kong Government, 1938, p. O12；羅富國教育學院，1989，頁 6）。這些建議後為港府採納。

1939 年 9 月，政府師資學院（Government Training College）成立，日師、女師隨之停止招收新生。1940 年 7 月，二年制的日師在送走最後一屆畢業生後停辦，三年制的女師則於第二年夏天停止運作。從政府隨即在女師利園山道校舍開辦東區漢文女子學校，並以陳逸馨為該校校長這一事實來看（謝蘊儀，1959，頁 31），女師並沒有併入政府師資學院。至於是否有部分女師的教學人員轉入新成立的師資學院，則有待進一步考證。政府師資學院後以總督羅富國（Geoffry A. S. Northcote）命名，改稱羅富國師資學院（Northcote Training College），日治時期被迫關閉，戰後復辦，1951 年中文改稱羅富國師範專科學校，1967 年再改稱羅富國教育學院（Northcote College of Education），直到 1994 年併入新成立的香港教育學院。

在其開辦的二十一年中，女師總共培養了二百零二名合格教師。由於它是官立師範學校，其畢業生在尋找教職時得到教育司署的大力支持，就業情況普遍較好。另外，以女師學生平均七成的畢業考試通過率來算，應當還有六十位左右的女師肄業生。她們中的某些人（甚至大部分人），也極有可能在師資短缺的情況下受聘為教師，其情形就像那些不能取得教師證書的大埔師範學校肄業生，照樣獲得學校聘用一樣（方駿，2001，頁 145）。以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香港的人口和學校規模來看，得出女師畢業生對本港的女子教育作出重大貢獻的結論似乎並不為過。

八、結語

本文利用所能收集到的零散文獻資料，簡單地勾勒了官立女子師範師學堂的開辦背景、師資、學生、課程、畢業生就業情況以及停辦原因。由於文獻資料所限，加上筆者無法找到現仍健在的女師畢業生做口述歷史訪問，還有很多關於女師的細節一時無法弄清，如師資方面，教師的來源、平均規模（非二十一年裏的教師總數）、兼教情況；學生方面，學生的家庭背景、是否住校、畢業生的整體

就業情況、傑出畢業生；學習方面，學生是人人攻讀同樣的課程，還是各有不同的專業（如是否有各自的主修和副修）；附小方面，小學生來源、畢業後升學去向、僅設五六年級的原因、附小校舍等等，這些都有待進一步收集材料、深入探討。作為探討女師歷史的第一個嘗試，本文並不奢望成為研究這所早期師範學校的終結性作品。若能藉此引發更多、更具體的相關研究，則本文的目的就達到了。

參考文獻

- 王齊樂（1996）。《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 方美賢（1975）。《香港早期教育發展史 1842-1941》。香港：中國學社。
- 方駿（2002）。〈官立男子漢文師範學堂（1920-1940）：早期香港師資的重要搖籃〉。於 2002 年 5 月 13-15 日在香港浸會大學「教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研討會上宣讀。
- 方駿、何麗芳（2001）。〈官立師範學堂（1881-1883）：香港最早的全日制師訓機構〉。《教育研究學報》第 16 卷第 2 期，頁 315-330。
- 方駿（2001）。〈大埔官立漢文師範學堂（1926-1941）：新界基礎教育的開拓者〉。《教育學報》第 29 卷第 1 期，頁 137-156。
- 方駿（1999）。〈鄉村師範專科學校（1946-54）：香港教師教育史上的重要一頁〉。《基礎教育學報》第九卷第一期，頁 1-19。
- 毛禮銳、沈灌群主編（1988）。《中國教育通史》，第五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 田正平、肖朗主編（2000）。《世紀之理想：中國近代義務教育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 白直甫（1954）。《白直甫先生詩文鈔》。香港：作者。
- 阮柔（1948）。《香港教育：香港教育制度之史的研究》。香港：進步教育出版社。
- 吳天放（1969）。《雲窗筆記》。香港：上海印書館。
- 吳倫霓霞、鄭赤琰（1989）。〈香港華文教育發展與中國的關係〉。載鄭赤琰、吳倫霓霞編，《兩

- 次大戰期間在亞洲之海外華人》（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 169-185。
- 邱小金，梁潔玲、鄒兆麟編（1993）。《百年樹人——香港教育發展》。香港：香港市政局。
- 金文泰中學（1962）。《金文泰中學新校舍落成紀念特刊》。香港：金文泰中學。
- 香港大學中文學會編（1990）。《香港大學中文學會六十周年紀念特刊》。香港：香港大學中文學會。
- 香港漢文師範同學會漢師校史編印委員會（1967）。《香港漢文師範畢業同學同學錄》。香港：香港漢文師範同學會。
- 陳謙（1985）。〈香港舊事聞見雜錄（二）〉。載廣東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香港一瞥》（廣州：廣東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頁 8-76。
- 區大典（1970）。《老子講義》。台北：藝文印書館。
- 湯開建、蕭國健、陳佳榮主編（1998）。《香港 6000 年》。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
- 鄧城鋒（2001）。〈香港學制演變：文化角度的分析〉。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未刊稿。
- 楊鐵夫箋釋，陳邦炎、張奇慧校點（1992）。《吳夢窗詞箋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楊鐵夫（1974）。《清真詞選箋釋》。香港：龍門書店。
- 趙世光編（1963）。《香港漢文師範同學會會刊》（第 18 期）。香港：香港漢文師範同學會。
- 賴際熙（2000）。《荔垞文存》。香港：學海書樓。
- 譚雪梅（1950）。〈我們的校長：陳逸馨女士〉。載趙士光編，《香港漢文師範同學會會刊》復刊第 2 期（香港：香港漢文師範同學會），頁 14—15。
- 謝蘊儀（1959）。〈陳逸馨先生事略〉。載趙士光編，《香港漢文師範同學會會刊》第 14 期（香港：香港漢文師範同學會），頁 31。

羅富國教育學院歷史編輯委員會（1989）。《羅師五十年 1939-1989》。香港：羅富國教育學院。

羅富國教育學院（1989）。《羅富國教育學院金禧特刊 1939-1989》。香港：羅富國教育學院。

Belilios Public School for Girls (1948). *Belilios School Journal*. Hong Kong: The author..

Burney, E. (1935). *Report on education in Hong Kong (Burney Report)*. Hong Kong: Crown Agents for the Colonies.

Cheng, I. (1976). *Clara Ho Tung: A Hong Kong lady*.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Grossman, D., Au, S.K. and Fang, J., eds. (2002). *An oral history of Hong Kong's colleges of educa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Education Department (1914). *Annual report on education*.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Education Department (1928). *Annual report on education*.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Harrison, B. (1962).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first 50 years*. Hong Kong: H K University Press.

Hoe, S. (1991). *The private life of old Hong Kong: Western women in the British colon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Government (1919). *Annual administrative report*.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Hong Kong Government (1928). *Annual administrative report*.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Hong Kong Government (1932). *Annual administrative report*.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Hong Kong Government (1933). *Annual administrative report*.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Hong Kong Government (1935). *Annual administrative report*.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Hong Kong Government (1938). *Annual report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progress of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1938*. London: H.M. Stationary Office.

Hong Kong Government (1939). *Annual administrative report*.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Sweeting, Anthony (1990).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1841 to 1940: Facts and opin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Yu, B. (1999). *The Arches of the Years*. Toronto: Joint Centre for Asia Pacific Studi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 York University.

作者

方駿，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高級講師兼副系主任

(Received: 25.8.03, accepted 11.10.03, revised 14.11.03)

Email: jfang@ied.edu.hk